

目 录

一、《永乐大典》的修纂起因及经过·····	1
二、修纂《永乐大典》的组织机构及主要人员·····	7
三、《永乐大典》的重录·····	11
四、《永乐大典》的厄运·····	14
五、《永乐大典》的收集和影印·····	21
六、《永乐大典》的价值及利用·····	24
附录一：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的佚书书目·····	34
附录二：现存《永乐大典》卷目表·····	112

现在常说的百科全书，大约相当于我国古代的类书。成书于汉代的《尔雅》，就是世界上最古的一部百科性辞书。以后，历代封建王朝都修纂过类书。三国曹魏有《皇览》，六朝梁代有《寿光书苑》、《类苑》，隋有《北堂书钞》，唐代有《初学记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文思博要》等，宋元两代修纂的类书就更多了，不光有官修还有私修，其中以北宋官修的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册府元龟》最为著名。但气魄之雄伟，内容之宏富，却要算明代的《永乐大典》。《永乐大典》是明成祖（朱棣）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，保存了大量的我国十四世纪以前的文学、艺术、史地、哲学、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，比法国狄德罗、达兰贝主编的百科全书和著名的《大英百科全书》都要早三百余年，所以，《永乐大典》不仅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，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。

一、《永乐大典》的

修纂起因及经过

早在明太祖（朱元璋）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年），新中举的进士解缙任中书庶吉士，经常在朱元璋的身边，他见到明太祖很喜欢观看刘向的《说苑》、阴时夫的《韵府群玉》。但他

认为这两部书在内容和编纂方法上,都有不少问题,认为:《说苑》“溺于妄诞,所取不经”,《韵府》“钞缉稂莠,略无可采”,表示愿意邀集“志士儒英”,修纂一部新的类书。朱元璋很赏识解缙的志向和才能,因为其他原因,没有进行。洪武三十一年(1398年)明太祖又命令侍读唐愚士蒐集“经史百家之言”,想编一部《类要》,就在这年的闰五月间,朱元璋病故,这件事便耽搁下来了。

《永乐大典》的修纂,开始于明成祖(朱棣)永乐元年(1403年)七月间。为什么朱棣登位不久就要立刻提议修纂大型类书呢?明太祖死后,因太子朱标早卒,依据封建帝王传位的惯例,帝位应当由嫡长孙朱允炆继承。朱允炆就是建文帝,他很年轻,看到叔父们都握有重兵,据守四方,深感这是对自己统治的威胁。于是采用了亲信齐泰、黄子澄的“削藩”建议,削夺藩王的兵权。朱棣是明太祖的第四子,封燕王,驻守在我国北方边疆。他以“靖难”之名,起兵反抗,并于建文四年(1402年)率兵攻入南京,赶走建文帝,自己做了皇帝,历史上称为明成祖。这次事变,实际上是叔侄间的帝位之争,依照封建正统观念,有点“大逆不道”,为此引起了方孝孺等士大夫的反抗。朱棣想利用纂修类书,炫耀文治,藉以笼络人心,消弭朝野间的不平之气。同时,后来还流传着建文帝匿藏在僧庙里的传说,《永乐大典》决定重修时,把僧人姚广孝请出来,并征召了不少的僧人道士,这也反映了明成祖的意图所在。

明成祖命令解缙、胡广、胡俨、杨士奇等来负责编纂一部大型类书,并交待了编纂宗旨,他说:“天下古今事物散载

诸书，篇幅浩穰，不易检阅。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，而统之以韵，庶几考索之便，如探囊取物尔。尝观《韵府》、《回溪》二书，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，记载太略。尔等其如朕意：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，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，修辑一书，毋厌浩繁。”这里提到的《韵府》指宋人阴时夫的《韵府群玉》，《回溪》指宋人钱諷的《回溪史韵》，都只有二十余卷。明成祖认为这两部书“采摘不广，记载太略”，而他要求编纂的类书，是要把天下古今各类典籍，不厌浩繁，混熔于一书之中。

解缙等召集一百四十七人，匆匆编纂，第二年（即永乐二年）的十一月就编成了《文献大成》。明成祖览后，认为“所纂尚多未备”，过于简单，不符合他的原意。于是在永乐三年（1405年）再命姚广孝、郑赐、刘季篪、解缙等人重新修纂，并召集了朝臣文士、四方宿学老儒达二千一百六十九人，分别担任编辑、校订、绘图、圈点等工作。

《永乐大典》修纂时，制订了凡例，全书依照《洪武正韵》的韵目，“用韵以统字，用字以系事”的编辑方法，将自古以来书籍中的有关资料整段整篇，甚至整部地抄入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当时辑入的图书包括经、史、子、集、释藏、道经、北剧、南戏、平话、工技、农艺、医学、志乘等达七、八千种。永乐五年（1407年）《大典》定稿，姚广孝撰写了《永乐大典表》进呈。明成祖审阅后，非常满意，并亲自撰写了序言，赞扬《大典》“上自古初，迄于当世，旁搜博采，汇聚群书，著为奥典”，正式定名为《永乐大典》。于是向全国各地征集了一大批各色善书人，开始清钞。到第二年冬天便正式完成了。全书

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，目录六十卷，分装成一万零九十五册，约三亿七千万字。

《永乐大典》与以前历代修纂的各种类书相比较，有三方面的特点。

第一，在编纂方法上。我国古代类书的编纂方法有分类的，有按韵相编的，也有以数目字来编纂的。一般官修的大型类书，以分类编纂的为多。象《太平御览》分五十五部，部下又分五千四百二十六类。宋代另一部大型类书《册府元龟》分有三十一部一千一百零四门。由于类目纷繁，往往容易把同一条资料拆散，有时又会造成同一条资料重复出现，给编制体例上带来混乱。查索者如不熟悉分类部目，检索也很困难。《永乐大典》采取按韵与分类两者相结合的“用韵以统字，用字以系事”的编纂方法，也就是依照《洪武正韵》的韵目，按每韵下分列单字，在每一单字下详注该字音韵、训释和它的篆、隶、楷、草各种书体，再依次把有关天文、地理、人事、名物、以至奇文异见、诗文词曲等随字收载。明成祖称赞这种编辑方法是“揭其纲而目毕张，振其始而末具举”。查索者只要“因韵以求字，因字以考事，自源徂流，如射中鹄，开卷无所隐”，检索非常方便。

其次，《永乐大典》收辑各类典籍之宏富，也是其他类书无能望其项背的。唐代的《艺文类聚》收书一千四百三十一一种，宋代的《太平御览》比《艺文类聚》庞大得多，亦只收一千六百九十种。《永乐大典》收书达七、八千种之多，等于以前大型类书的五、六倍。在收辑典籍的内容上，它一反过去类书偏重儒家经典、史传文集的传统做法，收辑的典籍极为广

博，上自唐虞，下至明初的经史子集百家之言以及天文地志、阴阳医卜、僧道技艺等等，真是包罗古今，无不搜述无遗。从当时修纂《大典》时所用图书情况来看，也可以了解到这一点。修纂《永乐大典》时启用了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全部藏书，犹嫌未足，还指派苏敬叔等人分赴各地采购图书。明成祖对图书也很关心，曾经问副总裁郑赐、解缙等人：“文渊阁的书够不够？”解缙回答说：“经史两部大体齐备，子部阙略较多。”明成祖说：“一般读书人只要有余钱，都要买书，何况朝廷，怎么可以没有图书呢？”他马上命令人四处收购遗书秘籍，并且还说：“买书不可以计较价值，不管多大价钱，统统买下，这样大概可以买到奇书了。”又如修撰人员柴钦说他的老师赵执谦撰有《声音文字通》一书，应当采录。明成祖马上派人到浙江余姚赵家把书取来。由于明成祖的重视，准备了丰富的图书供修纂人员采择，以致《大典》收入的典籍总数达七、八千种之多，超过了以往任何类书。

第三、《永乐大典》在装帧上也别具一格。全书采用上等白宣纸，印有朱丝栏，每半页八行，大字占一行，小字钞成双行，行二十八字，用极为端正的楷书抄写，墨色黝黑，微发古香。对于名物器什、山川地形等皆绘有图形。所绘之图，全用白描手法，形态逼真，精丽工致，是古代书籍插图中的佳品。凡征引书名和圈点，全用朱笔，相当醒目。版心亦为朱色，上鱼尾内标有“永乐大典卷××”，下鱼尾内记每卷页码。每册高营造尺一尺五寸六分，宽九寸三分。书面硬裱，用粗黄布连脑包过，显得格外庄重朴实。每册三十至五十余页不等，有一卷一册的，亦有二卷或三卷一册的，但以二

卷一册者居多。每册外封左上有一长方框，内题“永乐大典”四字，其下用双行小字注明卷几至卷几。右上角有一小方格，题该册所属韵目，又低一字再注明这一册又是该韵目的第几册。这样“考索之便”，真如“探囊取物”了。

《永乐大典》不仅是我国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，而且就其书籍本身，也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。

当然《永乐大典》也并非十全十美。由于急于成书，又出于众手，故违乖体例，前后不一，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是不少的。例如照《大典》编纂体例是“用韵以统事，用字以系事”的原则，《窃愤录》应隶于“窃”，《灌顶经》应隶于“灌”，可是前者竟错隶于“录”，后者又误隶于“顶”，因而全文割裂，首尾不相连贯。所以《四库全书提要》批评它“割裂庞杂，漫无条理”。也有误把篇名当作书名或书名、作者误写的，如卷二二五九《种瓠法》条引王禎《谷谱集》，其实《谷谱集》是《农书》中的《谷谱篇》，谱讹为谥，又误增集字，容易使读者误以为王禎另有一部著作叫《谷谱集》。卷三五一九引苏过《斜川集》，误过为迈。此外断句上也有不少舛错。尽管《永乐大典》有这些疵垢，但是，由于《大典》辑录典籍是采取“未尝擅减片语”照录原书的方法，这就保存了一大批古籍，它比起清代纂修《四库全书》时任意将古籍窜改删削，更有上下床之别了。

二、修纂《永乐大典》的组织机构及主要人员

《永乐大典》的修纂，从永乐元年（1403年）修《文献大成》算起，到永乐五年（1407年）定稿进呈仅五年，如果从永乐三年（1405年）重修算起，只有三年。这样一部煌煌巨制，在短暂的时间内完成，应当说是速成的。其纂修过程及详情，可惜史籍中有关具体记载很少，我们只能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钩稽出其大体情况。

这么大的一部著作，参加人员又是如此之多，假若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细致的分工，显然不易把工作做好。在决定重修之后，纂修上的主要问题是扩大收书范围，也就是如何把“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”全都包罗在这一部大型类书里面，编辑机构的组织一定要适应这一需要。

《永乐大典》修纂时的组织机构的最高负责人是监修，由资善大夫、太子少师姚广孝，礼部尚书郑赐，侍读解缙担任。以下是副监修，亦是三人，为刑部侍郎刘季篪、翰林院修撰兼右春坊右赞善梁潜、通政司右通政李至刚。监修以下设有都总裁、总裁、副总裁，其次为纂修、编写人、缮录及圈点生等。整个编辑机构分工由监修、总裁总其大成，都总裁一人由陈济担任，负责调节和沟通监修与总裁、副总裁之

间的情况。副总裁除参与总的计划工作外，大致还兼管一个部门的实际任务，领导若干纂修人员，从事搜集和加工本部门的图书资料。在副总裁中，如林环兼《书经》副总裁，王彦文兼《诗经》副总裁，高得暘兼《三礼》副总裁，蒋用文、赵友同兼医经方副总裁，释道联兼释教副总裁，从这些人担任的职务来看，显然是与他们个人的专长相结合的。如果副总裁所主管的部门范围较广的话，再分成若干小组，修纂人员按照所分工的范围搜集资料，然后将所有资料由编写人依韵目编排和连缀起来，再由校对人员负责核实资料，最后是缮写工作。此外还设有“催纂”五人，监视编辑工作的进度。整个编纂机构虽然庞大但并不臃肿，人手众多却没有造成杂乱。由于组织严密，分工细致，保证了整个工作的顺利展开。

修纂《永乐大典》的最高负责人监修姚广孝、郑赐、解缙三人，不象一些达官贵人修书时徒挂虚名，而是从商订《大典》凡例直到定稿，做了许多工作。姚广孝，僧名道衍，年十四岁即出家为僧。他从小好学工诗，而且擅长阴阳术数之学。朱棣“佐定天下”，他“论功以为第一”，他还担任过重修《太祖实录》的监修。解缙，吉水人，洪武二十年进士。修纂类书是他长期的夙愿，在修《大典》之前，曾参与修撰《太祖实录》、《烈女传》等书。修纂《永乐大典》时，他“刊定凡例，删述去取，并包古今，搜罗隐括，纤悉靡遗”，起了很大作用。副监修、总裁、副总裁中也有一大批博学之士。总裁胡俨，从小好学，对天文、地理、律历、医卜等方面的典籍，“无不究览”。副总裁曾棨学识渊博，有一次明成祖曾摘录各种书上

的疑难隐僻的事情来专门考问曾筮，他应对如流，“靡不悉对”。因为副总裁除参与总的计划外，还担任一个部门的实际工作，所以分配工作时，要知人善任，与他们的专长结合，如对礼学颇有研究的高得旸担任三礼副总裁，“分掌三礼，编摩有方”，清人曾查核《大典》中的三礼诸条，认为他对“前人经说，去取尚为精审”。又如王彦文擅长《诗经》，著有《诗经旁通》一书，由他来担任《诗经》副总裁，是非常恰当的。医经副总裁蒋用文、赵同友，他们本是太医院的御医，释教副总裁是高僧释道联，无疑也是极为合适的人选。

《永乐大典》是部百科全书，涉及范围极广，必须发掘和汇集各种学科的优秀专业人材。为此，永乐三年和四年曾各征召过一次纂修人。由在朝的官吏或地方的官吏荐举人选，经过考核，予以录用。这次征召来的修纂人员中，大部分是地方府、县的训导教谕，有的甚至是布衣诸生，他们虽来自民间，却有不少是学识渊博，赋有专长的。姚广孝等善于识别人才，破格任用。都总裁陈济，武进人，他以布衣身份被征召来担任都总裁，并对《大典》的修纂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他不仅与姚广孝、解缙等人把《大典》的体例制订得秩然有法，十分得体，而且修纂人员工作中发生的疑难问题，他都能“应口辨析无滞”，没有人不佩服他的该博的。永乐三年征召来的滕用亨已年近古稀，学问极为博辩，尤其精通“六书之学”，明成祖曾召见面试篆书，他书“麟凤龟龙”四个人字，又献《禎符》诗三首，得到明成祖的称赞。又如对民间文学很有修养的李昌祺，擅长阴阳之术的裴仕杰，精通星历和数学的薛富，以医道著称的沈永、江奚修，对佛学释藏

造诣很深的高僧释壁庵、释惟寅、释慧暉等都为修纂《大典》发挥了自己的专长。

永乐五年《大典》定稿后，又征召了一批缮写人员和画师，进行清钞。这些人员中，有不少人是技艺高超，擅长篆隶楷草的书法家和工于绘画的艺术家。

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修纂《永乐大典》荟萃了全国各方面的优秀人材，怪不得当时有人以“天下文艺之英，济济乎咸集于京师”来形容这种盛况。

此外，对编纂者在工作上、生活上也提供了不少优裕条件，这也是不可缺少的。明成祖让编辑人员到皇家图书馆阅读图书，使他们“尽读禁中之书”，“学识益进。”为了上班行走方便，把他们安置在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等地居住，并由光禄寺负责伙食，“朝暮酒馐”，供以茗果。每日晚餐后允许出游少息。为了编纂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，特发给“膏火之费”，“仍免朝谒”，诸如此等，无疑保证了修纂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三、《永乐大典》的重录

《永乐大典》是在南京文渊阁纂修的，文渊阁又是当时皇家藏书的地方，所以修成后就贮藏在文渊阁的东阁里。永乐十九年(1421年)北京新宫建成，迁都北京，明成祖命令从南京文渊阁的藏书挑选了一部分运来北京，暂时收贮在左顺门的北廊下，直到正统六年(1441年)才移入北京的文渊阁。《永乐大典》大概是同时从南京运来北京的，由于特别重视，运到北京以后就贮藏在文楼。

永乐七年十月《永乐大典》清钞完毕后，有人提议过刊刻，明万历间南京国子祭酒陆可教又建议交各省督抚分批刊刻，都因“工费浩繁”，只好作罢，只是重录过一部。

嘉靖三十六年(1557年)，宫中发生了一次大火，三殿被烧毁，文楼在三殿附近，明世宗一夜下了三、四道命令，由于抢救及时，《大典》得以保全。明世宗是非常喜欢《大典》的，案头常备置数十册，经常翻阅。为了防止不测之虞，明世宗很想重录一部，多次同建极殿大学士徐阶谈过。嘉靖四十一年(1562年)秋，正式决定重录，任命礼部侍郎高拱、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瞿景淳为总校官，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张居正，翰林院修撰林嫌、丁士善、徐时行，翰林院编修吕旻、王希烈、张四维、陶大临，检讨吴可行、马自强等担任。为了物色善书人，吏、礼两部主持了“糊名考试”，招收儒生程道

南等一百零九人，并为重录工作增置了服务设施和人员，如：内府御用监调拨了画匠、硃〔yā〕光匠、纸匠等，顺天府提供砚台、水罐、笔墨，惜薪司供应取暖的木炭，光禄寺负责酒饭，翰林院支付书写人员“月米”，此外还配备了警卫人员。

重录时还订有规章制度，规定缮写人员晨入晚出，每次领取《大典》必须登记，不许私自携带外出雇人代写。每人每日钞写三页，“如遇差错，发与另写，不拘一次二次，只算一页”，发现有混报怠工者，要“罪坐各官”。每册《大典》重录完毕后，于册后注明该册重录总校官、分校官、写书官及圈点人员姓名，以示各人职责。我们今天查阅《大典》，没有发现丝毫挖改涂补的痕迹，可见当时是严格执行了规章制度的。

重录工作整整用了六年，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(1567年)四月方才完成。重录副本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。重录之初，徐阶认为《永乐大典》是上万卷的巨帙，不是短时间里能完成的。他主张只要抄一部副本就可以了，所以在版式上不必仿照原书，只照经书尺寸，书法也可不拘。后来他翻检《大典》时，发现有大字小字，又有山川、宫室、草木等图形，觉得如果版式一动，行款图画都要变动，反不如照原样摹写来得方便，这才决定重录本全仿永乐钞本。据见过永乐钞本的徐阶说，永乐本还要讲究，他赞叹说：“旧本缮写得太好了，要找这样的钞写人已是很难的呀！”

重录之后，《永乐大典》有了两个钞本，一般人称重录本为“嘉靖钞本”或“副本”，永乐间修纂本为“永乐钞本”或“正本”。正本大概仍归藏文楼或文渊阁，副本贮藏在新建的皇

史窳。

还有两个问题，需要澄清，即到底重录几部和正本是否送归南京？由于过去一些典籍记载错误，造成不少误解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，“选礼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，重录正副二本”，并注云“事见《明实录》”。今查对《世宗实录》，只是说“上意欲重录一部”，并没有说二部，《总目》称“二本”，肯定是弄错了。依据当时重录时每人每日三页的速度计算，估计到隆庆元年可以钞成一万一千八百本，这与《大典》实数一万一千九十五本，相差无几，也只可能钞成一部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又说，重录完毕后，“仍归原本于南京”，这也是错的。早在隆庆元年之前一百一十九年，即明英宗正统十四年[†](1449年)，南京文渊阁已被大火烧毁，原本送归南京之说，自然不能成立。至于在缮录永乐正本之前的原稿本，大概一直存放在南京文渊阁，倒极可能在正统年间那场大火中化为灰烬了。

四、《永乐大典》的厄运

《永乐大典》的命运，象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一样，受尽种种磨难和摧残。虽然有正副二部，但都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。

先说正本的失踪。

明成祖虽然动员和化费了众多的人力物力修纂了《永乐大典》，但明代各代帝王中查阅过《大典》的却寥寥可数。据记载只有明孝宗和明世宗两人最喜欢读书，常阅《大典》，明孝宗曾经把《大典》中的医药秘方抄赐过太医院，明世宗案头常置数册，按韵索览。这都发生在《大典》重录之前，用的当然是永乐正本。《大典》重录之后，有关《大典》下落的记载很少，以致以讹传讹，弄得扑朔迷离，隐晦难觅了。明神宗万历中南京国子祭酒陆可教曾建议刊刻，但他没有说用哪个本子来刊刻。太史令李维桢说过“其书（指《大典》）冗滥可厌，殊不足观”的话。他对《大典》的看法当然是错的，但从他的话来看，好象见过《大典》似的。从他们二人的言行，可以看出明万历中《大典》是完整不缺的，何况这时离重录还不到三十年呢！至明末，有些人就认为《大典》已经不存在了。明史专家谈迁在《国榷》中说：“万历末，《永乐大典》不存，抑火失之耶？”谈迁以为正本、副本早在万历末年已经不存在了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里也持有

与谈迁同样看法，认为“全部皆佚”。明末宦官刘若愚，熟悉宫廷内情，写了本书叫《酌中志》，以记述明末宫闱旧闻秘事著称，他说：“旧《永乐大典》二部，今又见贮于何处也？”在明清之交，宫里宫外的人，由于不知道《大典》所在，因此疑猜它已经不存在了。

清代康熙间，徐乾学、高士奇等人在皇史宬发现了《永乐大典》，是嘉靖抄本，并已有残缺。徐乾学认为，《永乐大典》在“鼎革时亦有佚失”，也就是说副本在明清之际已有散失了。雍正间又把《大典》副本从皇史宬改贮在翰林院。李绂、全祖望在翰林院也见到过。全祖望却认为正本没有遗失，藏在乾清宫里，他曾经想建议用宫里的正本来补配副本。直到清末缪荃孙也抱有与全祖望相同的观点，而且他认为正本是在嘉庆间乾清宫失火时销亡了。其实全祖望、缪荃孙等对正本的下落都是猜测之辞。乾隆九年至十四年间，在编制《天禄琳琅书目》时，把宫中的善本都集中在乾清宫旁边的昭仁殿进行编目，如果宫中藏有《永乐大典》正本，怎么会不编入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呢？后来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屡叹《大典》副本不全，曾在宫里宫外都找过。《永乐大典》是万卷以上的巨帙，如果正本藏在宫里，是很容易发现的，可是并没有找到。清高宗曾作诗说：“《大典》犹看永乐传，搜罗颇见费心坚。兼及释道欠精覆，久阅沧桑惜弗全。”清高宗对《大典》不全亦无可奈何，可见《永乐大典》正本在清代以前已经亡佚。但正本何时亡佚，史籍没有明确记载，一般人估计毁于明清变动之际。《永乐大典》正本的亡佚，无疑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次巨大损失。